

国家、移民与地方社会：

# 河湟汉族研究

李健胜 郭凤霞 著

两汉以来，王朝国家在河湟的开疆拓土引发了当地社会政治、民族结构、人文生态等的变迁。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冲突融合、交流激荡的历史过程中，河湟地区开始了漫长的内地化进程……



人民出版社

国家、移民与地方社会：

# 河湟汉族研究

李健胜 郭凤霞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岳改苓

封面设计:张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移民与地方社会:河湟汉族研究/李健胜,郭凤霞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01-014468-9

I. ①国… II. ①李… ②郭… III. ①汉族-移民-研究-青海省

IV. ①D6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2261 号

### 国家、移民与地方社会:河湟汉族研究

GUOJIA、YIMIN YU DIFANG SHEHUI; HEHUANG HANZU YANJIU

李健胜 郭凤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7-01-014468-9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第一章 汉族移民与河湟地区的人文生态变迁 ..... | 4  |
| 一、河湟汉族移民的来源 .....          | 5  |
| 二、两汉至隋唐时期河湟地区的汉族移民 .....   | 8  |
| 三、两宋至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的汉族移民 .....   | 11 |
| 四、汉族移民与人文生态变迁 .....        | 14 |
| 第二章 河湟汉族人口发展述略 .....       | 18 |
| 一、两汉至元明时期河湟汉族人口概况 .....    | 18 |
| 二、清代及民国时期河湟汉族人口概述 .....    | 23 |
| 第三章 王朝国家视野中的河湟汉族 .....     | 29 |
| 一、两汉至宋元时期 .....            | 29 |
| 二、明清及民国时期 .....            | 33 |
| 第四章 河湟汉族与地方社会的冲突 .....     | 39 |
| 一、汉族移民被排斥、掳掠的历史过程 .....    | 39 |
| 二、兵祸、战乱下河湟汉族的悲惨命运 .....    | 43 |
| 第五章 河湟汉族的衣食住行 .....        | 50 |
| 一、服饰 .....                 | 50 |
| 二、饮食 .....                 | 55 |
| 三、建筑 .....                 | 66 |

|                            |            |
|----------------------------|------------|
| 四、交通 .....                 | 75         |
| <b>第六章 河湟汉族的婚丧礼俗 .....</b> | <b>87</b>  |
| 一、婚嫁 .....                 | 87         |
| 二、丧葬 .....                 | 94         |
| 三、礼俗风尚 .....               | 98         |
| <b>第七章 河湟汉族的宗教信仰 .....</b> | <b>108</b> |
| 一、儒教 .....                 | 109        |
| 二、道教 .....                 | 112        |
| 三、汉传佛教 .....               | 116        |
| 四、藏传佛教 .....               | 118        |
| 五、基督教 .....                | 123        |
| <b>第八章 河湟汉族的文化教育 .....</b> | <b>128</b> |
| 一、儒学教育 .....               | 128        |
| 二、近代教育 .....               | 140        |
| <b>第九章 河湟汉族生计述略 .....</b>  | <b>158</b> |
| 一、农业生产 .....               | 158        |
| 二、手工业、商业 .....             | 161        |
| <b>第十章 总论 .....</b>        | <b>166</b> |
| 一、国家对河湟地区内地化进程的影响 .....    | 166        |
| 二、汉族移民与河湟内地化进程 .....       | 170        |
| 三、河湟地方社会变迁及其反思 .....       | 173        |
| <b>参考书目 .....</b>          | <b>177</b> |
| <b>后    记 .....</b>        | <b>183</b> |

## 前言

《后汉书·西羌传》中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这是传世文献中有关“河湟”的最早记录。此处的“河湟”，特指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涵盖的地域范围包括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及大通河流域构成的“三河间”地区，即今青海日月山以东，祁连山以南，西宁四区三县、海东地区以及青海海南、黄南等地的沿河区域和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河湟地区是中原地区与青藏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过渡地带，也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接壤之地。

两汉以来，王朝国家在河湟的开疆拓土引发了当地社会政治、民族结构、人文生态等的大变迁，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冲突融会、交流激荡的历史过程中，河湟地区开始了漫长的内地化进程。至近代，来自内地中原的社会文化因素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文化形态，这一点在时人林鹏侠的《西北行》<sup>①</sup>、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sup>②</sup>、马鹤天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sup>③</sup>、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sup>④</sup>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sup>⑤</sup>等作品中都有所记述展示。抗战前夕，河湟地区的内地化程度使本土人士难以认同其为边疆地区的政治定位，他们认为：“居江浙者，恒目青海为西陲之地，然详览全国地势，甘肃之皋兰，实居全国中心，而青海省固邻近皋兰，西部尚有三千七百里长之新疆省在，徒以青新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平昔未之注意，故以西陲目之，其实非然也。”<sup>⑥</sup>然

① 林鹏侠著，王福成点校：《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陈赓雅著，甄墩点校：《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 马鹤天著，胡大浚点校：《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 顾颉刚著，达浚、张科点校：《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⑥ 李积新：《青海之农垦问题》，《新青海》第1卷第1期，引自徐丽华、李德龙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第3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73页。

而，河湟地区为民族国家视野中的边疆地区的事实并不能因此而改变，相反，正因为它是民族边疆地区，多民族共存社会现实背景下的内地化进程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点在杜常顺先生的《论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sup>①</sup>、半一之先生的《青海民族历史的特点与民族文化的特性》<sup>②</sup>及丁柏峰先生的《河湟文化圈的形成历史与特征》<sup>③</sup>等文章中早有体现。

目前，有关河湟地区民族宗教、社会历史诸问题的研究成果日臻丰硕，这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不无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领域兴起社会史研究风潮。社会史被认为是一个专门史，也有学者认为是通史或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国外，社会史曾被看作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史，是去政治化的人民史。至今，学界对社会史也没能作出统一的界定，但无论如何，社会史研究始终都强调“自下而上”的整体史观，关注社会底层及边缘人群的历史。

当学者们把历史变迁置于空间纬度，以实现总体史和底层研究的学术关怀时，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运而生。区域社会史是研究一定区域内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区域社会史把特定的区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关注传统史学忽略的边缘性人群和边缘性问题。区域社会史研究既是社会史研究的细化，也是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它在区域的空间中继承和实践着社会史“自下而上”的整体史追求。显然，河湟地区属于典型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对象，它的历史存在形态、民族分布、社会经济等都具有十分典型的边缘特质。

在河湟区域史研究中，汉族移民问题颇受学界关注。田芳、陈一筠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略》<sup>④</sup>一书，简要地探讨了河湟地区的移民问题。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移民史》<sup>⑤</sup>一书，对历代河湟汉族移民有过较深入的研究。上述作品系整体史研究成果，河湟移民问题既不是作者研究的重心，也不是重点讨论的专题。与此相较，一些区域社会史领域内的成果则更具有针对性，如

① 杜常顺：《论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② 半一之：《青海民族历史的特点与民族文化的特性》，《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③ 丁柏峰：《河湟文化圈的形成历史与特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④ 田芳、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⑤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刘建丽、段有成二位先生的《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sup>①</sup>一文,对宋代河湟汉族移民问题有过研究。郭凤霞女士的《古代河湟地区人口发展情况述略》<sup>②</sup>一文,较详实地论述了河湟境内的人口发展问题。姚兆余先生的《明清时期河湟地区人地关系述论》<sup>③</sup>一文,也较翔实地论证了明清时期的军屯、民屯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地矛盾等问题。石志新教授的《清末甘肃地区经济凋敝和人口锐减》<sup>④</sup>一文,利用统计数据,详解同光回变所导致的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甘肃地区人口锐减的情形及其原因。

河湟汉族是典型的边缘人群,这一群体的存在本身昭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地区性差异,以及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既可以揭示特殊汉族人群的历史与现状,也可以借此探究河湟地区多民族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关系和结构变化,以便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边疆地区社会的演变及其特征。

我们在此书中,利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内地化”的分析工具,对汉族移民与河湟地区的人文生态变迁、汉族移民人口发展概况、王朝国家视野下的汉族移民、汉族移民的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问题展开讨论,借此来了解这一特殊的移民群体在历史上的存在形态及其对开发边疆所作出的贡献。受制于我们的研究水平,本书难免存在着诸多不足,敬请学界同仁不吝指正。

① 刘建丽、段有成:《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② 郭凤霞:《古代河湟地区人口发展情况述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③ 姚兆余:《明清时期河湟地区人地关系述论》,《开发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石志新:《清末甘肃地区经济凋敝和人口锐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 第一章 汉族移民与河湟地区的人文生态变迁<sup>①</sup>

河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距今 5000 年左右,生活在河湟地区的主要居民是马家窑文化人群,其高度发达的彩陶文化是河湟地区原始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代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马家窑文化中的彩陶、生产工具、聚落遗迹等的分析,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作业方式的,兼有畜牧和狩猎活动。<sup>②</sup> 距今 4000 年左右,马家窑文化被马厂文化所取代。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彩陶更为发达,<sup>③</sup>人们在陶罐中还发现了那一时期的居民们储存起来的农作物种子,<sup>④</sup>说明这一时期河湟地区的居民更倚重农业生产方式。在辛店、卡约文化时期,河湟地区的居民曾经历了一次大的人文生态变迁和气候变迁,农业生产所需的自然地理基础发生了大的变化,农业所需的环境承载力也逐步下降,农业生产方式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游牧业。相关考古工作已证实,卡约文化时期,河湟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已走向游牧化,蓄养食草动物成为主要的作业方式。<sup>⑤</sup> 由此可知,河湟地区早期的人文生态系统随着居民的变迁、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作业方式的改变,曾经历过一次大的重组进程。

由农业生产作业方式为主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知识传承到以游牧作业方式为主的人文系统建构,是河湟地区早期居民利用和适应自然资源、创造

---

① 本章原载于《西北人口》2010 年第 4 期,有改动。

②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 年第 1 期。

③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7~98 页。

④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 年第 6 期。

⑤ 高东陆、许淑珍:《青海湟源莫布拉克约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0 年第 11 期。

更为适宜的人文生态系统的结果。到西汉前中期,和中原地区相较,河湟地区已经成为一个生态的、社会的和文化形态的边缘地区。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河湟地区逐步迎来汉族移民,这一地区的人文生态系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一、河湟汉族移民的来源

移民活动是指人的聚居位置在空间上做移动,迁移的过程则是在特定的推力和拉力的双重作用下完成的。葛剑雄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有各种类型,有其不同的特点,但就性质而言,却基本只有两种——生存型和发展型。”<sup>①</sup>对于河湟地区的移民而言,导致中原人口迁入河湟地区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历代中原政权的移民政策,换言之,河湟地区的移民类型主要是“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sup>②</sup>。

具体而言,河湟汉族移民的来源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由政府牵头组织汉族由中原地区迁往河湟地区,这种移民可称为“政策性移民”。历代王朝皆视移民实边为治疆良策,因此,直到清代,河湟汉族移民的主体仍为政策性移民。

为隔绝匈奴与羌族的联系,西汉在河湟地区实行“徙民实边”之策。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羌联合匈奴进攻西汉边塞,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兵反击“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sup>③</sup>。“永平元年,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传。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sup>④</sup>始自两汉的政策性移民,是河湟地区最早的汉族土著的前身,之后,政策性移民迁往河湟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例如,隋炀帝时期,击败吐谷浑,“伏允遁逃于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

①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② 同上书,第60页。

③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第2877页。

④ 同上书,第2880页。

里，南北两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sup>①</sup>。

第二，由戍边士卒转化而成的移民也是河湟汉族移民的一大来源。

戍边士卒既是中央王朝开疆拓土的军事主体，也是屯田垦殖的主要劳动力。自赵充国屯田河湟以来，历代王朝皆以屯田为实边之策，诸多戍卒因屯田而留居河湟，成为当地汉族移民的一大来源。至唐代前期，“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sup>②</sup>。唐玄宗时，“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缗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婉养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sup>③</sup>唐明宗“天成中，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海来贡，明宗召见，承海云：‘凉州东距灵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旧有郛人二千五百为戍兵，及黄巢之乱，遂为阻绝。超及城中汉户百余，皆戍兵之子孙也。’”<sup>④</sup>

正如明人张钟在《屯田议》中所指出的：“昔唐德宗问李泌复府兵之策，以兵多食少，欲减京西戍兵。泌请发左藏积缗，因党项易牛，铸农器，耒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夏秋耕荒田而种之。沃土久荒，收入必多，戍卒获利，则愿耕者众。既因田致富，则不思归。及戍期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食而遣之。是后收入既腆，耕者愿留，家人愿来，变关中之疲敝为富强。”<sup>⑤</sup>戍边士卒是中央王朝屯田实力的主体，自然也就成为重要的移民来源。

第三，弛刑徒或犯禁之人被发配至河湟，进而成为当地居民，这也是中原汉族移居河湟的一种方式。

自西汉以来，弛刑徒或犯禁之人被发配至边疆，是配合中央王朝移民实边之策的一项具体措施。例如，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时王莽秉政，讽羌献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筑五县，徙天下犯禁者处之，周海亭燧相望”<sup>⑥</sup>。西海

① 《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年版，第 3189 页。

②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年版，第 913 页。

③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 年版，第 5236 页。

④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7 年版，第 14152 页。

⑤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王昱主编：《青海方志资料类编》上册，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4 页。

⑥ （清）杨应琚纂修，李文实校注：《西宁府新志》卷二〇《武备》，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19 页。

“在湟中西”<sup>①</sup>，即今青海湖地区，西海郡所辖五县，部分在河曲地区，即今青海海南州境内，部分在大通河流域上游地区，即今青海海晏县三角城一带。弛刑徒及犯禁之人徙于上述地区，说明汉族移民的步伐已迈进河湟西缘区域。

北魏高宗文成皇帝年间，由河湟地区投奔北魏的源贺提出将死罪之人移往河湟，以实边地：“贺上书曰：‘臣闻：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全；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然犯死之罪，难以尽恕，权其轻重，有可矜恤。今劲寇游魂于北，狡贼负险于南，其在疆场，犹须防戍。臣愚以为自非大逆、赤手杀人之罪，其坐赃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是则已断之体，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渐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几在兹。虞书曰“流宥五刑”，此其义也。臣受恩深重，无以仰答，将违阙庭，豫增系恋，敢上誓言，唯加裁察。’高宗纳之。已后人死者，皆恕死徙边。”<sup>②</sup>

犯禁之人被发配至河湟的典型事例即是明初南京珠玑巷<sup>③</sup>居民远徙河湟一事。据民国人士马鹤天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十八日，他在青海大通老爷山下游访，“又有一桓姓者来谈，据云南京人，祖居南京竹竿巷，因明太祖初登基时，宫中庆祝春节，有社火，令全城人民分日轮入宫内游玩，时马娘娘亦在宫中观之，人民望见笑呼马娘娘，但马娘娘面上多麻，见人民笑呼，误以为呼麻娘娘，大怒，询知该日入游者为竹竿巷人，遂一律流放至西北青海，今西宁城内尚有数家，皆竹竿巷人也云云。专制时代皇帝之权威，固属可畏，然亦或系当时移民之一法，因明初曾移民至青海也”<sup>④</sup>。今天，翻检河湟地区汉族家谱，仍可见祖先因得罪皇后而发配至河湟的记载。

此外，游宦之人也是汉族移民的来源。历史上，曾事宦于河湟者为数不少，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居于此，经年历久，其子孙后裔遂成为当地土著。早在两汉时，赵充国之后赵掾居破羌县任三老即是一例。马鹤天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十八日，在老爷山下，“至一商号稍休息，主人湘人，来此已十

①（清）杨应琚纂修，李文实校注：《西宁府新志》卷二〇《武备》，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9页。

②《魏书》卷四—《源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1页。

③“珠玑巷”又称“竹竿巷”“珠子巷”等，在不同的家谱、民间传说中说法不一，可能是音讹的结果，应指同一地点。

④马鹤天著，胡大浚点校：《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178页。

年。据云因游宦流落青海，以此间土地价廉，故居之，普通每亩价仅四五元，但每年仅收粮斗余，近年因负担较重，白赠人亦每无人愿耕”<sup>①</sup>。

## 二、两汉至隋唐时期河湟地区的汉族移民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云：“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两汉时期，羌族是河湟地区的主要居民，他们所从事的主要作业方式为游牧业。《后汉书·西羌传》亦云：“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可见，部分羌族在河湟地区也从事农业生产。之后，河湟地区成为人口迁移和屯田垦殖的目的地，这一地区的人文生态系统也随着历代中原政权的“屯垦戍边”和“移民实边”政策逐步从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变。河湟地区的此次人文生态系统变迁始于两汉时期汉族屯田河湟的活动，至晚清时仍在持续。此次河湟地区人文生态系统的变迁主要是通过强势文化的生态移植完成的，其背后的推力是历代中原政权的“大一统”政策。在较少考虑自然环境因素、原有人文生态对土著居民的儒化以及环境承载力等的情况下，中原农耕文化及其人文生态系统深刻地改变了河湟地区的人文风貌。

汉初，匈奴“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sup>②</sup>。河湟羌族为匈奴所挟，时常侵扰汉朝边地。据《汉书》卷四九《晁错传》，汉文帝时，晁错提出“徙民实边”的建议，他认为“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随着汉朝国力的充实，他的这一建议到汉武帝时得以实践。据《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这是西汉政权向河湟地区移民的前奏。也是从汉武帝始，汉政权确立了“征伐四夷，开地广

① 马鹤天著，胡大浚点校：《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②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第2876页。

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sup>①</sup>的政策。《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记载,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羌联合匈奴进攻西汉边塞,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兵反击,羌族“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实之。”元鼎六年(前111年),李息、徐自为还进占河湟腹地,并在这一地区迁徙汉族,开置公田,这是中原政权向河湟地区进行政策性移民的开端。

据《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汉宣帝时,河湟羌族叛乱,西汉政府派老将赵充国进兵湟中,平定羌乱。为确保河湟地区的长治久安,赵充国建议政府“罢兵屯田”,汉宣帝“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赵充国利用来自淮阳、汝南等地区的士兵和弛刑、应募之人屯田,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播至河湟地区。

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新莽时期,在湟水以西、青海湖周围地区设立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为充实西海郡人口,王莽不惜扩大“犯禁”的范围,“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数万”。西海郡郡城包括今青海省海晏县甘子河乡的尕斯古城、今青海省共和县曲沟乡的曹多隆古城、今兴海县河卡乡宁曲村的支东加拉古城等。<sup>②</sup>,这说明这一时期龙羊峡以上的黄河两岸及湟水上游也曾留下中原汉族移民的足迹。

东汉时期,政府在河湟地区析置护羌校尉、金城郡,后又从金城郡析置西平郡,并在河湟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后汉书》卷四六《邓训传》记载,永元元年(89年),护羌校尉邓训击败烧当羌后,令2000多名弛刑徒在黄河两岸“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至永元十四年(102年),东汉政府在黄河两岸共屯田34部,加上原有在湟水地区的屯田,东汉政府在河湟地区的屯田规模远超前代。

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时期在河湟地区展开的屯田实际上是军屯,其主要劳动力为戍卒,所移之民大多也为弛刑徒和应募之人,特别是“终东汉一代,朝廷既无实力,也无向西北移民的意图,而只能强迫犯罪的死刑犯及其家属迁往边区。这类迁移虽然也有屯田或开发的作用,但主要是军事防御的紧迫需要”<sup>③</sup>。

①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第2876页。

②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0页。

③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161页。

不过，“在长期的屯田实边中，一批又一批的内地汉族留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形成了西陲边疆新的土著，他们为青海东部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sup>①</sup>

东汉末年，河湟地区的羌族多次起义反抗汉政权的统治与压迫，经过多年的战争，河湟地区人口离散、生产败坏，汉族移民及其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人文生态亦遭到破坏。据《三国志》卷一六《苏则传》，曹魏时期，金城郡“户不满五百”，西平郡的户口损失也很严重。苏则任金城郡守后，收辑流亡人口，还“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另据《三国志》卷五《明元郭皇后传》，曹魏政权还营造西平郡城，兴修水利，整治陋俗，使河湟地区“风化大行，百姓归心”。河湟汉文化也得以兴盛，出现郭、麴、田、卫等土家大族，其中，郭、麴二姓家族成员对曹魏两晋时期河湟地区的政治与文化多有影响。<sup>②</sup>

东晋时期，羌族进一步东进，河湟地区的行政建制遭到破坏，汉族豪强趁势在此地形成割据政权。据《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当时中原政局纷乱，“避难之国唯凉土”，受张氏前凉等政权的招募，大批汉族也从内地移居至河湟、河西一带。

十六国时期，河湟地区成为民族迁徙、交汇之地，氐、羌、鲜卑等民族先后在此地建立过政权，其中河西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政权对河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据《晋书·秃发乌孤载记》记载，南凉政权广泛收笼“夷、夏俊杰”，其行政建制亦仿照汉制，这说明河湟地区已有的汉文化对南凉政权多有影响，也说明汉文化在当时河湟地区的人文生态系统中开始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吐谷浑在青海建立政权后，也大力吸收汉文化，司马、博士皆用汉族儒生。这一时期，除部分汉族由中原迁入外，“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各政权都作过几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但一般仅限于河西地区内部，至多不超出河湟地区的范围”<sup>③</sup>。

唐朝在青海东部设鄯、廓二州，以管辖河湟地区。据《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吐蕃攻灭吐谷浑政权后，河湟地区成为唐和吐蕃的必争之地。为了防御吐蕃的扩张，唐朝不仅“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缗帛为军资”，还“屯田

①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73～76页。

③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3页。

以资糗粮,牧使以婉羊马”,河湟地区成为唐朝重要的屯田之地。唐朝前中期,唐蕃两国以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为界,相约两国和好,无相侵掠。安史之乱后,驻守河湟地区的唐军人中原靖难,边备空虚,吐蕃趁机攻战河西、陇右之地,河湟地区为吐蕃所掠。

吐蕃政权对河湟汉族采取强制同化的政策,当时汉族处境悲惨。<sup>①</sup>《通鉴考异》卷一七引《建中实录》云:“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吐蕃)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随着吐蕃统治的深化,时间已久,“逾代之后,斯人既没,后生安于所习”,出现了“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族”<sup>②</sup>的情形。诗人贾至作《送友人使河源》云:“举酒有遗恨,论边无远谋。河源望不见,旌旆去悠悠。”感叹国无良谋,边塞沦丧。<sup>③</sup>在这一时期的河湟地区人文生态系统中,吐蕃文化占有主导地位,原有的汉族移民普遍被吐蕃化。与此同时,汉族想要收复河湟的愿望较为强烈。唐人做诗云:“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sup>④</sup>据《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记载,长庆二年(822年),刘元鼎入吐蕃会盟,沿途见“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中唐诗人吕温曾作诗:“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作汉村。樵采未侵征虏墓,耕耘犹就破羌屯。金汤天险长全设,伏腊华风亦暗存。”河源军故址在今青海省平安县境内,唐肃宗时为吐蕃所占,四十多年后诗人来到此地,仍见汉村耕地、伏腊华风。<sup>⑤</sup>可见,尽管河湟地区受吐蕃管辖,但汉族居民及其作业方式已深深扎根此地。

### 三、两宋至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的汉族移民

北宋时期,散居在河湟地区的吐蕃人建立了以青唐城为中心的确厮啰政

① 汶江:《吐蕃统治下的汉族》,《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

② 《全唐诗》卷六三三《河湟有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261页。

③ 赵宗福选注:《历代咏青诗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7页。

④ 《全唐诗》卷三八二《陇头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284页。

⑤ 赵宗福选注:《历代咏青诗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1页。

权，史称青唐政权。为了制衡西夏，北宋对青唐政权采取了羁縻怀柔政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宋仁宗庆历四年条），在西北边防问题上，宋人主张“凡边上臣僚图实效者，在于选举将校，训练兵马，修完城寨、安集蕃、汉，以备寇之至而已。”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四（宋神宗熙宁四年条），宋神宗时，权力上层在河湟边防问题上的看法出现分歧：文彦博认为招纳吐蕃无补于事，王安石却认为“不烦兵，不费财，能抚结生产，不为西人所收以为边患，焉得为无补？”他还认为，“我以天下之大，四夷不敢伐，不敢忽，非文王之事也。且元后作民父母，使疆场之民为夷狄所陵，岂不得已？然此事要以谋，不可以力，当居万全之地以制夷狄之命而已。”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宋神宗任用力主“开边”方略的王韶发动熙河之役，王韶虽然曾攻占了河湟要地，但因遭到吐蕃各部的强烈抵抗，最后无功而返。又据《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〇（宋徽宗收复鄯郭州条），宋徽宗时，宋军又攻入河湟地区，“开拓疆境幅员三千余里，其四至：正北及东南至夏国界，西过青海至龟兹国界，西至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连接阶、成州界。计招降到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河湟地区重新被纳入中原政权的版图。据《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北宋王朝还“多方招刺弓箭手垦辟闲田，补助边计，以宽飞挽之劳”。在此地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并设立市易务和榷场，新的汉族移民也开始进入河湟地区。<sup>①</sup>

北宋在河湟的统治较为短暂，宋兵东却后，河湟地区又成为金、西夏等政权的角力之地。然而，经过数代中原政权的移民与开发，以农业为主的作业方式已扎根河湟。据宋人李远《青唐录》描述，宗哥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这说明湟水谷地的吐蕃人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河湟地区的人文生态日益受到汉族的作业方式及其文化传统的影响。

元朝在河湟地区曾设西宁州和贵德州，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土司制度。有元一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影响甚大，河湟地区的汉族人口不仅没能增加，相反，据《元史·刘容传》记载，蒙古军队初入西宁州后，曾将该州大批民户迁往原金朝属地西京大同路，西宁州户口不足 6000 人。在有关元史的相

<sup>①</sup> 刘建丽、段有成：《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青海民族研究》2003 年第 3 期。